

周素園文集

黔新登字01号

特约编辑：梁 燕 葛 美 黄竹琴
封面设计：石俊生
版式设计：闵 英

周 素 园 文 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 45印张 1060千字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册

ISBN 7-221-03436-2/Z·64 定价：45.00元

C53
101

本书编委会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叶方明

梁 燕 肖应荣

(依姓名笔画为序)

叶方明 李万寿 李立朴 肖应荣

张 烈 梁 燕 葛 美

本书编辑组

组 长
副组长

梁 燕

葛 美

(依姓名笔画为序)

成 员

王葆和 陈积忍 顾隆刚

唐 霞 黄竹琴 熊宗仁

《周素园文集》序

我和周素园相识，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那是我在红六军团担任政委，长征途中经过贵州的时候。

1936年2月，我红二、六军团攻占了黔西北重镇毕节。进城之初，有的基层干部不明情况，看到一座古旧宅院，料想是地主之家，便带人进去“打土豪”；不料却在书架上搜出好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书上密圈细点，说明都经书的主人仔细读过。他们奇怪了：“地主还读马列？”便把情况向上汇报，我马上派人把这家主人请来相见。他就是周素园。

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周素园的去以及他热心阅读马列书籍的原因。原来，他早年曾是晚清的贡生。在朝政腐败、国难日亟的形势下，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使他冲破了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樊笼，积极参加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贵州光复后，作为贵州革命元勋之一，他被推举为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但不久，大汉贵州军政府被贵州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唐继尧部滇军所颠覆。周素园被迫流亡，奔走于京、汉、沪、渝等地，一方面为了谋生，同时也企图借助外部力量恢复贵州的革命政权。但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正遇到重重困难，无力给予切实的支持；而求助于南北各派大小军阀，则无异于与虎谋皮。经过十几年的徒劳奔波，周素园失望地回到了家乡。但他并没有绝望，仍在积极地寻觅救国救民之路。这样，当他一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便热心地研读起来。

周素园的情况很快就受到贺龙、任弼时首长的关注，他们多次和周素园亲切会见倾谈。我和军团长肖克同志、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同志也反复向他讲解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特别着重宣传了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和我军北上抗日的任务。周素园结合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和从马列书籍中读过的理论，很快就提高了对党和红军的认识，表示拥护共产

党的领导，并且毅然同意出任由我军组建并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

由于周素园为人正直，在各阶层人民中有比较高的威信，他的参加革命工作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使我军在毕节地区得到了将近一个月的休整时间，并扩军五千人。

不久，我军主动撤离毕节，继续北上抗日，周素园不顾自己年迈多病，坚决要求随军行动。组织上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他对组织上派来劝说的同志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起初，周素园同志随我红六军团政治部行动。我和他经常同桌而食，同室而眠，朝夕相处，苦乐与共，不但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也增进了彼此间的革命情谊。长征的艰苦是众所周知的。他硬是坚持住了。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红军撤离毕节、转战乌蒙山期间，周素园利用他过去的社会地位，给当时云南地方军队的负责人龙云、孙渡写信，劝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红军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而不要助纣为虐，为蒋介石火中取栗。龙、孙接信后，从自身的利益考虑，果然放松了对红军的堵截，为我军胜利渡过金沙江造成了有利的战机。

由红二、六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后，为了方便作战，周素园奉命改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一直到长征结束。

长征结束后，他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和礼遇，还见到了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

西安事变时，他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给当时国民党的许多党政要人写信，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工作。

抗战爆发后，他受任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并受毛泽东同志亲自委派返回西南，从事地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临行前，毛泽东同志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称他为“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对他作了极高的评价。

我们再度相见，已是1951年10月，在解放后的北京，这时我才知道，在他离开延安以后，先后到了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每到一处，他都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开展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各地当局也加紧了对他的活动的监视限制和阻挠破坏，他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不断受到特务的威胁恐吓，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他被迫再度退隐乡里，清贫自守。这期间，他终日闭门读书，特别是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他也十分关注时局，热切地盼望着光明的到来。

光明终于到来了，1949年11月，周素园又在家乡迎来了解放。他出任县和地区的支前委员会主任，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解放给他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以和自己年迈衰弱之躯极不相称的旺盛精力，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党和政府联系教育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工作中，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他的工作和进步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党给了他更高的信任和荣誉。他这次到北京，就是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会议期间，他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单独接见，还会见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肖克等老朋友。

不料，这次重逢竟成了永诀，1958年2月，从贵阳传来了周素园病逝的噩耗。

周素园是我党和我军的老朋友和忠实同志，也是我个人的老朋友和忠实同志。对于他的逝世，我是很悲痛的。

现在，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决定编写《周素园文集》并交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这表明了我党对这位老朋友的深切怀念。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周素园的一生，经历了中国从“东亚病夫”到“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巨大历史变化。这个变化从何而来？一切别的路子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周素园文集》有助于人们客观地认识这个历史选择的进程。

周素园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历经艰难挫折，终于找到真理的一生。周素园一生的曲折经历，揭示了一条真理：在现代中国，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隔阻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只要坚持不渝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斗争中，他最终必定认同并走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康庄大道。《周素园文集》真实地纪录了周素园的也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心声，从而客观地反映了他们为寻找革命真理所经历的这一艰难历程。

周素园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经历了一个时代（清朝、民国、新中国）。在此期间，在贵州、西南乃至全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他都是亲历者或亲闻者。周素园平生勤于著述。他的文字，不仅以文采见长（在青年时，他便有“才子”之名），而且以严谨著称。《周素园文集》的编写出版，无疑可以为研究贵州、西南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提供又一份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我很赞成《周素园文集》的编写出版，并且很乐意地写了以上的话，作为这本书的序。

王震

1991年10·北京

毛泽东写给周素园的信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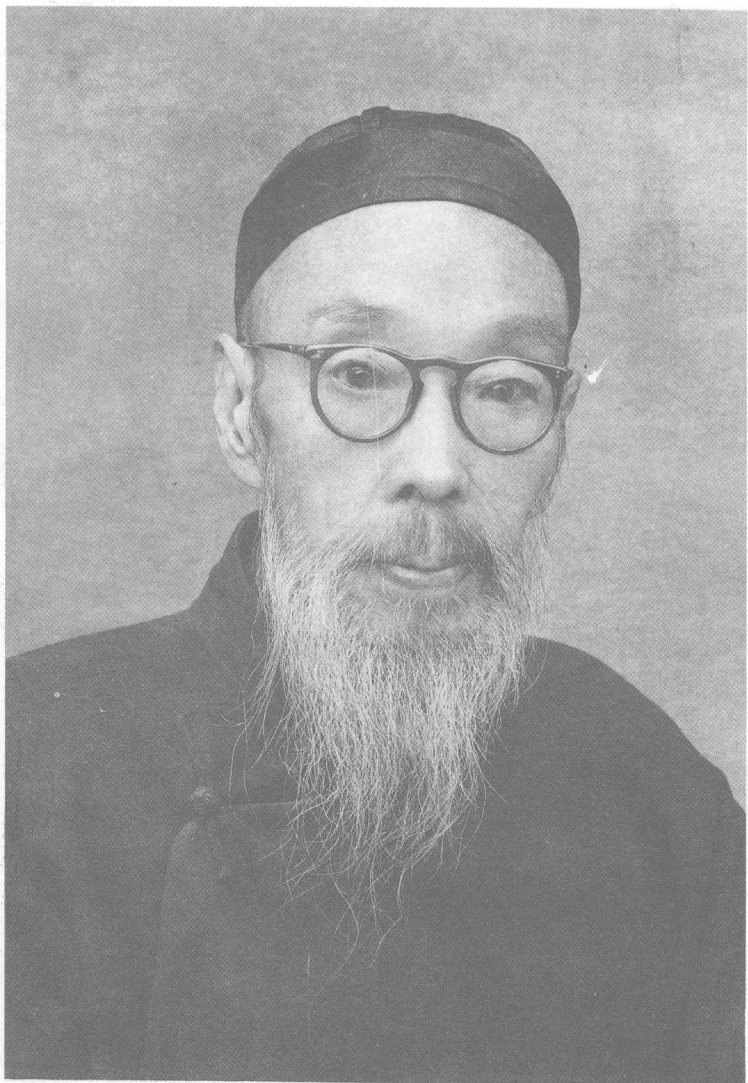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月六日

出发的挽回这些工作的
计划，为早已下了决心。我
为这样写好些问题，我完全部
同意的。路费^{路费}300元，
不知够不够，请你月已计算
一下告诉我。将来我们经费
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
出一点生活费大概上等的在
这^也一样。这^也全国为出是
一个奋斗的人，但是是万别
的。临别时请留下通讯处，
告诉我。何时见，我^也告诉你。
敬礼！

王东明

素因先生：

亲爱的。我们晓得是我们
的一方十分亲切而又为我的朋友
与亲属们，并不觉得你是
坐言他行。先生^{且作}的^{且作}完全
依用先生的健康问题来
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
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
照顾到，先生自己也应照顾到
的。只有在比较^更通气的个条件
与环境中，原使更有保证些
作才会好些。



出版前言

周素园生于1879年，歿于1958年，享年79岁。他漫长的一生，经历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和当时许多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有过程度不等的接触交往。时代教育了他，环境锻炼了他，使他这个旧时代的封建阶级知识分子，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最终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建设新中国的革命道路。

周素园不仅阅历丰富，而且长于词章，勤于笔耕，著作等身。他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论著、函电、日记。这些作品，不仅深刻地折射出二十世纪前半期在中国特别是在贵州大地上发生过的种种激流震荡、风云变幻，而且真实地勾绘出作者自身在这场大动荡中经历过的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思想发展轨迹。这是这些作品价值之所在，也是我们编选出版这部文集意义之所在。

这本文集的编辑原则是：广征、精选、求实、存真。

因为年代久远，世事变迁，周素园的许多作品或分散、或佚失、或毁损。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少困难。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作者遗属的全力支持和有关单位的热心帮助下，我们现在总共征集到各类文稿约400余万字，剔除不同版本的重复收录后，尚有300余万字之多。这自然并非全部。例如，作者在辛亥革命前主《黔报》笔政时在《黔报》以及后来在《西南日报》上发表过许多言论，只是当时多未署名，而今也不便遽认，只好付诸阙如。又如，作者随红军长征时，曾在手边找得到的一些零星纸片（例如

香烟盒皮)上随手写下许多笔记。直到40年代还曾有人见过的这些笔记,至今竟遍寻不获,大约已毁于后来的战乱。这只是目前我们知道而无法弥补的一些例子。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征集到的,在存世的作者遗稿中,可以算是比较完备的了。这本文集编入的100万字文字,就是从中反复斟酌、认真筛选的结果。

编辑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又由于作者在不同思想发展阶段中的认识局限性,再由于作者在特定环境中所处地位的特殊性,作者在某些作品(尤其是前中期作品)中,叙事论人,难免掺杂着一些片面、偏颇乃至失误之处。对此,我们要不要“为贤者讳”,或删除或改呢?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除一些重复和不关紧要的地方酌予删除外,其余悉依原文,不加改动。因为我们认为,对于被涉及到的人和事,历史自有、也多有正确的结论;作品中的有关论述,无论正确与否,都只是如实地记录下作者的思想历程,反映出他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和艰辛,当不至影响到读者对他以及对这些人和事的全面评价。

我们征集到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者为他人立言,且以他人的名义发表的,也有些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应时之作。由于其中不少在反映当时形势和作者见解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所以我们也适当选入。但这些作品毕竟是代笔之作,在立意和遣词上不能不受到许多限制。这和作者在其他作品中之能直抒胸臆是有区别的,读者当不难辨识。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对选入的作品尽量作了一些题解和注释。但因时代的隔阂,资料的欠缺,应注未注和注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匡正补遗,有待高明。

王震同志生前慨然为本书作序,肖克同志亲笔为本书题名,充分体现出他们对这位曾为人民做过好事的老朋友的深切怀念之情,为本书增色不少。

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省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对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最宝贵的支持。一些老同志对本书十分关切，悉心指导。记此，并志不忘。

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始终主持其事。贵州人民出版社大力支持了这项工作。一并说明。

本书编委会

凡 例

一、本书正文分自传、论著、一般函电（含代拟函电）、家书、日记五部分，依序编列。

本书附录收入作者生平大事年表，用资参考。

二、本书收入各篇，间有不同版本，则按择善而从的原则，分别选用较完整的版本，同时以其它版本参校。

三、为存真求实，本书对收入的作者原著文字，包括其中的年月、地名、人名、称谓以及对人对事的叙述评价等，一律保持原貌，不予改动。但在非作者原著文字（如题记、注释）中，则一律使用公元纪年、今地名和今人通用名，以便阅读。

四、本书各篇必要时附有题解。题解以“*”号表示，排在该篇首页下端。

五、本书的注释按各篇的数字单列，以6号小圆阿拉伯数字（①、②、③……）标于出注处末的上角。注文分别排在该篇正文之后。日记部分的注文，则排在该月记事之后。

本书的注释限于对文中史实（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的说明和勘正，不加评价，也不作文字性的注解。原则上只在首见处出注，一般不重注。对已广为人知的著名人物和重大史实，为节省篇幅，则不赘注。

六、文字性的校勘，一律随文夹排。错植字以方括号（〔××〕）订正；脱字以下加黑点（××）补足；缺损字或模糊不清有待辨正的字则以空方框（□□）代表。一般不作校勘说明。

七、本书各篇文字中，间有部分文字重复或与文中意旨无关之处，为节省篇幅，由编者在不违背作者原意的原则下，适当予以删节，并以删节号（……）标明。日记部分全系摘录，则不逐一注明。

八、本书一律按现行规定使用简体字排版。作者原著中使用的繁体字、异体字、古体字和通假字，均由编者径改，不另说明。原著中未加标点或所用标点不符现行规定的，也由编者重新标点。

周素园自传*

(1957年)

我现名周素园，原名周培艺。生于一八七九年三月七日①。
贵州省毕节县人。

在家中自学，没有进过任何学校，在前清是岁贡生。

十四岁开始独立生活。辛亥革命前在贵阳创办了贵州的第一种日报——《黔报》。又协同张百麟创办了贵州的第一个政党——自治学社，从事宣传和组织反对清代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加入了同盟会（其后改为中华革命党，即脱离关系）。参与了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贵州光复，担任了大汉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

滇寇唐继尧侵占贵州后，逃亡在外。曾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众两院秘书，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部、西北筹边使公署秘书。一九二一年回贵州，任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一九二二年转任定黔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同年八月转任贵州政务厅厅长，仍兼省府秘书长。一九二四年任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一九二五年请假回籍。闭门读书，不再与闻政治。

一九三六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至毕节。在二方面

* 本文转载自《贵州文史丛刊》1980年12月 第一期，未见原稿。经查《光明日报》，写作日期当为1957年9月19、20日。

文中涉及到的人和事，请参阅本书有关各篇的注释。